



中国
文化象征
词典

〔美〕W·爱伯哈德著
陈建宪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象征词典

(美) W·爱伯哈德 著

陈建宪 译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5

字数：280,000 印数：1—6,000

ISBN 7 - 5404 - 0547 - 3

精装：_____

G·12 定价：10元

序

这部《中国文化象征词典》，出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W·爱伯哈德笔下。他从三十年代开始，便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民间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国民俗研究及其他》和《中国历史》等书。本书的德文版于 1983 年在科隆问世，三年后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英文本，是一部为西方读者所注目的关于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书。

本书原名为《中国符号词典——隐藏在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书中收罗了四百多个词目，涉及动物、植物、数字、颜色、方位、日常用语、习俗信仰和神话传说形象等等。作者把它们作为中国文化中常用的象征性符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对其含义与用法一一给予简明的解说。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工作？这是因为汉语及其书面表达形式，在中国长期历史文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光彩。它于表层意思之外，还在深层隐含着更丰富的意味。许多词语既表示这种意思，又隐藏着另一些意义，因而运用起来便十分灵活，使人有奥妙无穷之感。本书《导论》引用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

“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

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

“他们形成了一个运用象征形式的社会。这种表达方式由于习惯而得到加强，并且将个人与公共秩序和道德结合在一起。”

“本书就是来寻求对语言的这种第二层交流的解释。”

这里所讲的第二层交流，就是它作为象征符号来使用时所隐含的意思。例如在民间婚礼中，常常撒红枣招待客人，这不只是因为枣子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果品，还由于它是“红”颜色，象征吉祥。特别是“枣”与“早”谐音，隐喻“早”生贵子。“蝙蝠”本是一种动物，因“蝠”与“福”谐音，便作为一种吉祥动物入画了。“吃醋”这一日常生活用语，同时又是男女恋情方面嫉妒的委婉说法。“云雨”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却成为男女性行为的隐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是，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上的中国人自己，因见惯用惯，反而不以为奇，爱伯哈德先生立足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上来观察这一语言文化现象，却感到新鲜别致，极有兴味，便以多年努力写成了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

本书收罗广博，在解说四百多个词目丰富多采的象征意义时，征引了广泛的口头与书面材料，特别注意从中国民间文学，通俗小说、民间习俗信仰和民间艺术品中取材。它不但注意尽可能对有关词目的多重隐含意义作出解释，还适当注意了它们的象征性在新旧时代的变化。对那些有可比性的词语，著者从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出发给予了有意义的比较。

本书是关于中国象征文化的一部入门书。著者告诉我们“，本书的目的，只不过是在中国象征宝库得到全面的评价之前，作为一个有关这个主题的入门，并且更多地保存这些遗迹。

由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作为一本专门的工具书，书中所收的词目难免不那么完全，同时，由于作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隔阂，书中的解说也有不准确之处。如对“八”这个特殊数字的多重寓意，书中讲了许多，可是忽略了它在中国民俗中的一个流行用法，即“要得发，不离八”，以“八”来象征发人发财。说“苹果”因和“平安”有一个字谐音，便成为人们喜爱的果品，这个习俗至今犹存，但书中说因汉语中的“病”和“苹”谐音，人们一般不送苹果给病人吃，这就不符合中国现代习俗了。这样的例子就用不着一一列举。然而瑕不掩瑜，它不仅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部很实用的工具书，即使对中国读者来说，它也是一部雅俗共赏，融汇着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和学术性的有益著作，相信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

刘守华

1989年4月

中国的象征语言（导论）

—

欧洲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比起过去几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古代，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人们对它知之甚少。经过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末，人们逐渐知道：中国是一个具有稳定的政府和良好风俗习惯的大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家。莱布尼茨（Leibniz）曾经写道：在中国，即使是农民，行为举止也非常高雅，他们从不发脾气。而在欧洲，这种高雅举止只是保留在少数贵族之中。

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由于军事上的软弱，很自然地成了殖民主义者暴力的牺牲品。清统治者与政府腐败堕落，想以严厉的（甚至是野蛮的）刑法来保护自己。大约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少数欧洲人开始认识到：西方对于中国、中国的语言知识、特别是拥有丰富的诗歌与散文遗产的中国文学，很有必要进行了解。例如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他曾是德国驻广州殖民地的牧师和传教士，他的翻译以及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在二十年代使德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他自己确信并且也使别人相信，西方人可以从东方的生活与思想方式中学到许多东西。他

说他本人在这两种文化中是一个调停者。今天，他已死去五十年了，我们依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吗？这个领域的一些学者对此回答是肯定的。他们以中国人的语言本身作为例证。中文里没有变格和动词变化形式，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感觉到这些词。中国人的“词”基本上由一个不变的音素组成——大约有四百个这样的基本音素。两个或更多这样的音素，可以组合成一个新词；此外，由于中国北方话有四声（即：每个基本音素能够发出四种不同声调，由此产生词意的变化），使得这些音素的含意扩大了四倍。不过，即使将这些都考虑进去，同音异词的数量仍非常多。另外，与西方语言的复杂形态结构相较，中文显然简捷多了。我们说“三本书（three books）”时，“三”里面已指明了复数，为什么还要加上个“s”呢？当我们说“昨天我去看过戏”时，“昨天”一词已清楚地表明它是过去的事，为什么还要将动词变为过去时态呢？为什么我们西方语言中必须将语法上的性表达出来呢？

当然，语言简洁也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撇开上下文，一句中文可能会很难理解。但是，无论我们是否知道一首爱情诗是某男写给某女的，还是别的人写的，它都可以增加爱情的魅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中文词汇是不能“拼音”的。假如一个中国人发现他在谈话中使用的某个词汇别人不明白，他就以食指写出这个汉字。所有汉字基本上都是图画，因此诉诸视觉。只有很少的汉字——大约二百个左右——是简单地描画自然物；其它所有汉字（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使用八千个汉字）都是复合符号。概括地说来，每个符号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图解部分（描画一个男人、女人、树、鱼等等），一个是语音部分，说明这个汉字如何发音。它的语音音素，是通过一个公认的发音符号来

表示的，这符号本身的内在含意已被忽略，它在这个复合符号中，只充当一个纯粹的语音角色。例如：我们一看见某个特定的汉字，就可以明白两种东西：首先，从图解部分可以看出它指的是某种作物，即它不是树、人或其它东西。其次，从语音部分，能够对它的读音作出推测。

上述所有汉字书写规则，一直应用到了现在。不过最近的汉字改革，已经导致一些基本变化。汉字简化使图解部分中的许多图形不再能被识别，更多的汉字必须记住。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次，中国人是“爱用眼睛的人”，对他们来说，每个字都是“象征”而不是声音标记，象征才是书写的基本功能。直到最近，中国的汉字还没有失去“象征”的作用。例如他们的“像”这个词就含有“图画”的意思。什么是“象征”呢？让我们撇开关于定义的烦琐讨论，暂时采用 C·G·荣格的简短定义：“如果对某个词或某幅画一瞥，就能从中领会更多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象征……”（《人与他的象征物》伦敦，1964）。我们这本书中涉及到的象征，或多或少表现了现实存在的事物，但它总是间接地表现。有些东西由于某种特定原因，不能够用词语表达，但它却能够被间接地表现出来。

费迪南德·莱森（Ferdinand Lessing）曾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从他说这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现在，本书就是来寻求对语言的这种第二层交流的解释。

在有些方面，我也从埃米尔·普雷托尤斯（Emil Preetorius）那里得到了启示。他曾有过一些最好的远东艺术收

藏品。他说过：“所有的东方绘画，都可以看作是象征，它们富有特色的主题——岩石、水、云、动物、树、草——不仅表现了自己本身，而且还意味着某种东西。有些东西在自然界事实上并不存在，它们既非有机物又非无机物，也不是人造物，东方艺术家们不是看到了它们，而是以象征来隐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能在这个人或那个人意识中再现出来，并且得到解释。”他还补充说：“图画与书法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相通，使它们之间常常相互渗透和融汇。”（《普雷托尤斯收藏目录》，蒙里奇，1958）。

二

普雷托尤斯提到，在中国学习写字与学习绘画密切相关，这无疑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们将它们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来看时，这二者之间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字中包含的信息，读者要求看懂它，或者至少是试图看懂它。而当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送给某个朋友一张画或一个书法条幅时，其中的“信息”则是用许多语言都无法表达出来的：它往往采取从古典文献中摘取一段引文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只有在接受者了解这段引文的来源，以及它与什么东西有关，才能懂得它的含意。我们可以说，这幅图画中包含着一个象征，或者说象征采取了图画的形式。无论是哪种情况，这图画皆能以两种方式“阅读”——作为一个艺术品来说，它的确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同时，它也可以表达对受赠者长寿，多子等等的良好祝愿。这幅图画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其中象征的内容，既能使旁人赏心悦目，又能给接受者一个信息，不过这信息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形式。

中国人对于人体或性的态度，在表达时更多地带有隐蔽的特点。中国人对于所有关于性的事情，总是非常拘谨。关于这一点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 多年，从那时起，他们在公开场合就以一种简略而隐晦的方式谈论性活动。但是到后来，所有关于性本能的东西，都以暗指和精心的隐喻来表达。聪明的孔子对性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他主要指的是婚姻。他认为不正当的性关系要严格禁止，但夫妻在房中却可以秘密地实际进行。后来的儒家走到了一个极端，发展为劝告丈夫们只要有可能，就避免与妻子的身体相接触。我们很怀疑这样的建议能否为丈夫们所实行。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公开地表达爱情或亲昵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并且被看作有失礼貌，有失规矩。在文学中，就象在艺术中一样，如果必须涉及性问题，就通过一种最巧妙的迂回方式，运用神秘和间接的象征，既不直截了当提及，又要使接受者能明确了解它的含意。对这种信息的发送者来说，看看接受者究竟能否明白其中隐藏的意义，总是一种特殊的乐趣。这些性的象征，多以一些双关的对应词组成。由于中文有着极多同音异义或同形异义词，所以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例如，“yǒu yú”这样的发音 既意味着“他有富余……”、“他有充裕的……”（例如谷子等）也意味着“有鱼”。因此，图画上画一条鱼，就是一个双关，这幅画的受赠者会立刻明白，赠送者是祝愿他“财富有余”。在其它语言中，鱼所象征的“有余”这个概念 必须考虑到“鱼群”或“鱼产下许多卵”才能联想出；但在中文中，它从“鱼”、“余”同音中便能直接地联想出来。

这类双关语诉诸于中国人的耳朵，但是它们也常常诉诸于眼睛。因为一些不按照官方语言，而是根据方言土语产生的双关语，常常很难懂。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更愿意让他们的双关语能为眼睛所领会。

在中国，肖像艺术从未发展起来。这不仅与西方绘画形成鲜

明对照，而且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肖像画的缺乏，部分地是由于下述情况：古代某个身居高位的要人死去后，就要请一位画家来为死者准备一幅遗像。画家来时，带来一张准备好了的穿官服的男人像，或者一张穿受觐礼服的女人像，图像上的面部空着，画家只要根据死者面部在图像上少许添上几笔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撇开皇帝和少数思想家，那么，事实上没有哪个活着的人对这种画像感兴趣。不过，无论活人还是死人，都愿意避开任何带有性意味的东西。男男女女总是画得衣冠楚楚。与此相比，西方即使在宗教肖像画中，也有裸体男女，而赤裸的婴儿在裸露的乳房上吮吮，更是司空见惯的。

对中国人来说，裸体是不文明的标志。即使那些有关“色情描写”的尝试，其场景与日本人赤裸裸的色情艺术相比较，也几乎是儿童般的纯洁。羞耻心与犯罪感，把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与孔子时代的思想紧紧联在一起。关于性的事情，只能以象征的形式，转弯抹角的隐喻以及其它方式涉及。

三

中国人的这种节制该如何理解？为什么他们所要做的或要说的东西，总是做得或说得那样隐晦？我以为：下述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几乎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人就聚居在很拥挤的地区以及人口集中的小村庄里。在这些村庄中，房子都尽可能地挨得很紧，以便最大限度地留出土地耕种。而城市中的房子象人群一样拥挤（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城镇一样），这样可以保持最小的区间，使城墙修得短一些，便于防守。

贫苦人家的小棚子，是以稻草和树枝建成的；一间较好的房子，才有砖墙和瓦顶。直到相当近的时代，墙上才简单地开扇窗

户，假使有能力的话，在上面糊上纸。房间以薄墙分开——而且常常是纸墙。房内说的每一句话，其它房间里的人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在许多世纪里，如果某家发生犯罪和过失，其近邻至少有五家以上“连坐”，即负有同样的法律责任。为了自己，他们必须向官吏陈述每一个细节，不允许申辩说自己不知内情。所以显而易见，尽可能少说话，尽可能避开在家庭和近邻中招致纠纷，才是明智的。同样，在古代艺术中，人们也避免公开描述性行为，免得招致其他人的伤害。在风景画中，人们更喜欢画人物和风俗，也是这个道理。通过巧妙地运用象征，社会内容可以进入风景画：一些拥有这些画的人可能看不懂，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看得懂，并发出会心的微笑。风景画表现出一个有序的和谐的世界：生命成为一个取舍的问题，你要得到别人的体谅，也必须对别人表现体谅。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到中国去过的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以稍许惊奇的口气描述中国人就象一个“老”人——他们理智、安详而又平静，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没有生气”。

欧洲旅行者所谓的“没有生气”，事实上是缄默：巨人的缄默，因为中国人总是将他们可能对别人的反应，或者他们可能要表达的意见，强压在心中。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运用象征形式的社会。这种表达方式由于习惯而得到加强，并且将个人与公共秩序和道德结合在一起。

中文直到近代，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观念中，都还没有我们的“自由”（freedom）这个词，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中文的“自由”（zi—you）这个词，其真正含意为“属于我本人的”或“由我独自”——它隐含有一种否定的意义。同样，近代以前中文中也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权利平等”（equality

of rights)。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哪个人能与别人相等：一个人与别人相比，要么年龄更大，要么更年轻一些；与女人相比，他要优越一等，因为他是男人；或者他在国家统治集团中，有着更高的位置。“兄弟之谊”曾把早期基督教徒们紧密连在一起，但在中国却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看作家庭中的一分子，对不是他家庭中的成员，他没有任何义务。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孔子伦理学，规定了每个人的责任，却很少提到他的权利。长期以来，教育的指导思想，就是调节受教育者的行为，以使其不违反“礼”——遵守规矩的良好的习惯与礼貌。

生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都进行着循环。从摇篮到墓地，在一个人一生中，男人以八年为一个周期，女人以七年为一个周期。一年分为四个阶段（有些宇宙观认为是五阶段）。“年由节联在一起，经验由习惯决定。”（理查德·威廉，《衰落的中国》）。举行大的季节节日的目的，是为了复活和加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在循环周期的一般顺序或符号顺序中，每年有十二个月，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个月有三十天，天地有五方（第五方是中央）和五星；宇宙分为三个层次：即天、地与处在中央的人。神本身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原来也是人，由于生前的美德，死后升到了天上。在他们之下，是一般的人。在最底层，则是那些死后变为恶鬼，或是关在地狱中熬炼，直到他的罪孽洗清为止的人。这三个世界从本体上看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层次不同而已。

四

假如我们将中国人用来作为象征的这些东西加以分类，就会

出现很有趣的结果。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最重要东西是人：他有着躯体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存在，并且有着自己的创造物与人造物。中国人的人生观在基本观点上非常一致，即：人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主要地位；对于人来说，动物、植物、甚至天和地皆是次要的，都是人的对象（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与《创世纪》中关于宇宙的说明相距不远）。

在生物中，动物比植物重要。不过，家畜不象野生动物那样常常被注意到。从中国人梦境的分析来看，牛、猪和家禽很少出现。植物的情形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用来作为象征的乔木与灌木，在日常生活中都很重要，或者是食物来源，或者是香料来源，或者是建筑材料。

云、雨、露、雷之类的自然现象，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动物则被人以一种矛盾的心理对待——它们中的许多威胁着人的安全，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令人羡慕和妒忌的财产。

“道”的概念——英文中常译为“道义”（**principle**）或“道理”（**reason**）——有许多层含意。它是由老子发展而来的道教所传播的概念之一。这个极为重要的词，也可以追溯到对自然的直接观察。在北中国，大雨过后的粘土和黄土上，要通过泥沼几乎不可能：除非有一条人工建造的道路（道），也即是“地上的秩序”。大多数象征，都是中国人可以用眼睛看到的東西，这些我们可以归纳为“形式的象征”。不过，汉字中有些概念，常常要求符号与其象征物本身在语音上相同，或者至少是关系密切（例如“福”=好运气，而“福”与蝙蝠同音，所以蝙蝠便被用来象征好运气）。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语音的”或“听觉的”象征。

有的象征还诉诸嗅觉与味觉。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触觉对于

中国人来说多么重要。有些东西感觉到象什么——它又冷又滑象玉石吗？它是光滑的、坚硬的、有韧性的吗？对这最后一类象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性质的”象征：一定的性质归属于一定的物体（特别是动物和鸟（例如人们相信鹰到老仍能保持它的力量））。

五

本书收有四百多个象征，哪怕随便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其中许多与几个基本的主题有关。这些东西关系到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及其理想愿望——希望有长寿而健康的生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官职，多子（即有许多儿子）。

比较起来，他们不怎么关心彼岸世界的事——例如死后会发生什么，再生的机会；神的仁慈或罪孽的逃避等等。中国古书上的神仙有几百位，实际上他们全在人间作为普通人而生活过；他们直到死了以后才被神化。作为神，他们比一般人（皇帝例外）更有力量，但他们能够被操纵，甚至被贿赂，就象地上的官吏一样。中国人思想体系中神与人的关系，与基督徒、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许多人都希望多子。儿子在父亲死后，必须照料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他们必须真心诚意地为他们死去的父亲上供，不然的话，其父就会变为“饿鬼”。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子，没有比死后没有留下儿子更可怕的了。这也是以前多妻制被允许的一个原因。不过多妻制一直未普遍实行，它只限于能够养活一个以上妻子的富人中。一般人的简单办法，是从亲戚中领养一个男孩，或许是一个侄子。由于生理原因的无子是可以得到理解的，这种体谅与强迫结成婚姻关系的家长专制，也有某种联系。多子愿望之下，隐含着许多性的象征，本书中对此将要进行探讨。

有些读者看过某些过去有关中国象征主义的书籍，如威廉（Williams）或耶特斯（yetts）的著作。这些书中几乎都没有关于性关系的任何资料。在我看来，这些作者似乎都既没有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也没有查阅中国学者们对这些资料的选择与解释。

事实上，在通俗小说与民间文学中，有许多令人惊奇的性象征，本书至少说明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性象征大多没有感官刺激，因此，在威廉和耶特斯的旧著中也可发现。但是，在这种纯洁的意识之外，还有第二层意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到性的含意。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么“明智的平静”。只有少数古典文学和哲学，才是安详而宁静的。而在诗歌中，则充满了性的暗示，只不过被巧妙地掩盖了起来而已。

中文象征意义的研究，对别的领域也能有所启发——如对中国思想范畴的研究，至今是一块处女地，但要真正了解中国人，它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让我们以“朝野”为例吧。朝指朝廷，野指荒野；朝是首都中心的一个庭院，野包括农村以及已开垦和未开垦的土地。但“野”也用于野生动物或者“狂热”的崇拜——对皇帝所不承认的神的崇拜。表面上，我们可以将“朝野”理解为“城市和农村”——但实际上它所隐含的意思却完全不同。再举一例，“山海”从字面上看是“山”和“海”，但它们复合在一起却不仅仅指山、海——它指的是整个国家。“山精”与“海怪”这个复合词包括了所有的精灵，这些精灵都或多或少对人有些危险。我们印象中的“山水”与“高山、流水”有关，但它却是绘画中“风景画”的代名词，因为这种画中，几乎全都是描绘山、河、溪、水的风景。

地震被说成“山摇地动”。象这种基于对比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如“纯一杂”、“高一低”等。所有这种对偶的复合词第

一个是阳性的，第二个是阴性的。这种语义学的研究，还不过是刚刚开始。

由于上述原因，这些被选出来讨论的单纯而简明的象征，并不仅仅代表“它们自己”。这些东西不仅是它们本身的符号，而且在象征系统中一再出现。例如眼睛，根据中文的上下文，眼睛不仅能表示它本身，而且与其它国家比起来，它的含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有些国家中，“罪恶的眼”能够被一张画着眼睛的图画挡开。然而中国人谈到眼睛，却采取一种象征或转弯抹角的词句。此外，眉毛象征着人物的特征，对那些知道如何阅读这种象征的人来说，很容易看懂。

六

与我们熟悉的欧洲宗教与艺术中的象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的象征极少用来表达宗教意识。它们的作用纯粹是社会性的。一个造访者一般都要带点礼物：哪怕是钱，接受者也不会感到这是贿赂。我们给朋友或亲戚送上一束鲜花；而中国人则是送上一个花瓶，一个彩釉盘，或是一个绣花钱包。无论是什么，都可能是一种隐喻的象征。

象征所表达的含意，用语词也可以表达得非常好；但中国人认为，运用语词太“原始”，而象征则要精巧得多。接受者必须尊重并研究礼物，这样他会发现两、三个象征线索，从中确定礼物所传达的是什么样的“良好祝愿”。某个人送出个纸包（无论包什么），如果是在生日或结婚时，这纸包必须是红色的。但是倘若在人家居丧时，看望者或出席者以红包来表达自己的同情，就是一种可怕的失礼。纸包常常不仅仅是只有红色的或白色的，还都以一种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方式包着，它也传递一种信息——表示